

清代朝珠研究的再省思

陳慧霞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佩帶朝珠是清代官方服飾制度極為特殊之處，本文在學者研究的成果上，重新梳理史料與檔案，比對朝珠實物的工藝及形制，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就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藉由朝珠的正名，說明朝珠始終兼容宗教與政治兩種性質；二、從清王朝與蒙古、西藏在藏傳佛教信仰上的互動，探索朝珠樣式形成的過程如何援引宗教的元素，轉化為政治的符號；三、藉由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窺探具有闡釋權的統治者如何形塑朝珠在官方服飾中的角色。

朝珠自始至終都兼具宗教與政治的色彩。其樣式早期受到蒙古數珠的影響，和宗教性數珠沒有明顯的區別。清王朝自順治朝（1643-1661）入關以後，統治對象擴大，涵蓋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漢族，在兼顧數珠的宗教性原則下，增飾背雲，發展出制度化的形制，賦予數珠政治性意涵。繼之，雍正朝（1722-1735）的正名從「朝裝嚴數珠」演變出「朝珠」一詞，是進一步為朝珠的政治身分取得名符其實的地位。

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早期為皇室與滿族貴族，康熙朝（1662-1772）擴大到中上品級的文武官員，是以國家重要官員為主體；雍正朝初年以後，加入紫禁城內與皇帝生活或文書相關的基層職官；乾隆朝（1736-1795）初年以後，隨著朝臣逐漸內廷化與近侍化的發展趨勢，朝珠成為隨侍皇帝大臣必備的配飾，遂使准用朝珠的群體超越官制品級的限制，成為皇帝親信的象徵；再加上禮部參與典儀人員，均須整齊劃一的掛朝珠，進一步傳達出佩帶朝珠與皇權、皇帝個人及其治術的密切連結，是以朝珠為符號，圈劃出一個高度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世界。

關鍵詞：朝珠、清代服飾制度、念珠、數珠、皇權、藏傳佛教

一、前言：東珠朝珠是清代帝系傳承的象徵

佩帶朝珠是清代官方服飾制度非常獨特之處。歷代皇帝及官僚系統往往藉由頂戴、袍服與革帶的顏色或圖案，標示穿戴者的品級身分，清代首創以胸前佩帶的珠串，稱為朝珠，作為身分的識別物之一。清代朝珠的特殊性很早就受到注意，學者多半引用《皇朝禮器圖式》與《大清會典》等記載，著眼於禮儀服飾制度的內容，主要討論的問題有三：一為朝珠的起源；二為朝珠本身的形制、材質以及製作；三為朝珠佩帶的規範。研究指出朝珠源於佛教念珠的樣式，因清代皇室尊崇藏傳佛教，藉佛教作為統治蒙、藏各族的手段，同時也由於游牧民族原有佩帶寶石項飾的習慣，因此朝珠被納入官方服飾制度的一部份，並藉以彰顯統治者本身的民族特色，學者的研究還提到，因東珠朝珠為皇帝專屬，故將朝珠視為清代皇權集中的象徵。¹

然而朝珠和念珠畢竟有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我們想進一步思考下列問題：從樣式的角度，念珠如何演變成朝珠，其轉變的關鍵何在？再從物品內在特質的層面考慮，念珠為宗教用器，朝珠為朝廷禮儀佩飾，社會習俗的信仰意涵又如何轉化為官方禮儀制度的政治符號？最後，當東珠朝珠作為皇權集中的象徵時，百官佩帶朝珠的意義是什麼呢？禮儀服飾制度的內容規範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制度演變的過程及其潛藏的內在意義，本文立基於學者已釐清朝珠的形制、使用規範等基本問題之上，透過重新梳理清代實錄及檔案等資料，仔細比對朝珠實物的工藝及形制，將史料與風格置於歷史時間的脈絡中思考，就以下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經由朝珠的正名，說明朝珠始終兼容宗教與政治兩種性質；二、從清王朝與蒙古、西藏在藏傳佛教信仰上的互動，探索朝珠樣式形成的過程如何援引宗教的元素，轉化為政治的符號；三、藉由朝珠使用群體的變遷，窺探具有闡釋權的統治者如何形塑朝珠在官方服飾中的角色。

1 清代朝珠相關的專文論述如下：嵇若昕，〈朝珠與帽頂〉，《故宮文物月刊》，22期（1985.1），頁92-97；莊吉發，〈服制鼎成——以東珠為飾看清代冠服制度的特點〉，《故宮文物月刊》，98期（1991.5），頁4-23；張淑芝，〈清宮朝珠與滿族東珠〉，《滿族研究》，1995年2期，頁39-42；樸文英，〈清代的朝珠與數珠〉，《滿族研究》，2001年1期，頁59-60；陳夏生，〈再談清代服飾的朝珠與手串〉，《故宮文物月刊》，274期（2006.1），頁88-96。樂擘，〈試論沈陽故宮博物院院藏朝珠〉，《滿族研究》，2009年2期，頁118-121；李芝安，〈清代朝珠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19期（2013.6），頁102-110。

朝珠是清王朝官方服飾制度中極為特殊的一項，然而一直到乾隆朝《大清會典》（乾隆二十八年成書，1763）、《皇朝禮器圖式》等政書，「朝珠」一詞才明確出現在官方服飾的規範之中，《皇朝禮器圖式》並清楚繪出朝珠的標準形式。因此朝珠什麼時候成為清代官方服飾的定制，就成為研究者首先面對的問題。有些學者主張在順治朝後期朝珠開始成為清朝正式的禮服佩飾，其論證的理由有三：第一，朝珠是由佛教念珠演變而來，又《建州聞見錄》記載，滿洲時期努爾哈赤手持念珠，故朝珠的使用具有長遠的歷史淵源；第二，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太祖（1559-1626；1616-1626 在位）、清太宗（1592-1643；1626-1643 在位）以及清世祖（1638-1661；1643-1661 在位）少年時期的畫像，都沒有佩帶朝珠，世祖皇后及皇太后畫像二者則均繪有朝珠，故推測世祖後期可能使用朝珠；第三，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盤標注「世祖」的東珠朝珠，證明世祖時已有朝珠。² 這些觀察並非全然有誤，只是淪入有無之間的爭辯，將朝珠演變的問題過度簡化，殊為可惜。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早在順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世祖親政³之前，朝珠已經是皇帝服飾中的一部份。

關於朝珠較早的相關記錄見於《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1612-1650）薨於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九日，順治八年二月：「癸巳，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睿王薨於出獵之所，侍女吳爾庫尼將殉葬時，呼羅什博爾惠、蘇拜、詹岱、穆濟倫五人至，囑之曰：王曾不令人知備有八補黃袍、大東珠素珠、黑狐褂、今可潛置棺內……」⁴ 同書順治十二年（1656）三月再度敘及此事：「庚子，初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許爾安各上疏稱頌睿王元功，……伊之近臣蘇克薩哈、詹代、穆濟倫、將伊王私匿御用東珠數珠、黃袍等件，並不法等情出首……」⁵ 以上兩段文字中的「大東珠素珠」和「御用東珠數珠」指的是同一物件，也就是東珠朝珠，關於早期朝珠往往以數珠稱之的問題後文再論，這條指摘多爾袞意圖自立為帝的記錄，正說明在順治皇帝親政以前，東珠「朝珠」已經是皇帝專有的佩飾。

2 樸文英，〈清代的朝珠與數珠〉，頁 59-60；樂擘，〈試論沈陽故宮博物院院藏朝珠〉，頁 118-121。

3 《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2，頁 410。

4 《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3，頁 421。這段文字同時見於乾隆朝《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454，卷 4，頁 79，云「王曾製八補黃袍，令與大東珠朝珠、黑貂褂置棺內」。

5 《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90，頁 708-711。

清高宗（1711-1799；1735-1796 在位）御製文〈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提到，朝珠淵源於佛教，在乾隆朝之前已經傳了五代，是滿洲的特產，後代子孫應該繼續恭敬守護：

我國家鄙金元之易漢服，仍尊舊制衣冠，加之黼黻，賁以朝珠。朝珠非古制，後世必議以為用佛禮者，然歷代所用，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承祀臨朝，堂皇煒赫百餘年，世德永昌，鴻鬯天庥，此萬禩子孫所宜欽守，弗失者也。至於朝珠實我黑龍江所產，自古帝王所不能致者，五代至朕，朝珠之數積至六百四十有八，斯亦三皇以來所未聞者矣。⁶

這篇〈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僅見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的《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的文淵閣本收錄的是內容相近的〈匣衍記〉。〈匣衍記〉是高宗為了說明他製作代表帝室傳承三類信物收藏匣所撰寫的專文，這三類信物分別是：「一以誌交泰殿所藏御用國寶，一以誌端凝殿所藏御用朝珠，一以誌壽皇殿所藏御用諸璽。」其中朝珠匣緣於「乾隆十七年（1752）春，閱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恭貯列聖禮服所御朝珠，更定為二十五層之匣，以俟奕葉，按代遞用，亦詳見本殿記。」關於二十五這個數字是「爰取周易大衍天數二十有五之義」，祈願上蒼慈祐大清王朝能代代相承，達二十五代之久，「我國家禮服飾以朝珠，祖宗所御，典禮攸存，定寶數之時，密用姬周故事，默禱上蒼，祈我國家若得仰蒙慈佑二十五代以長，斯亦遑矣。」⁷

檢視清代宮廷作坊實作的情況，查得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二十五日〈清代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承作活計清檔〉記事錄記載，清高宗傳旨查問盛裝二十五盤數珠單蓋箱的工作進度，⁸ 正如〈匣衍記〉所說，次年（乾隆十七年）朝珠匣完成了，今天我們看到標示：太祖、太宗、世祖、聖祖（1654-1722；1661-1722 在位）、世宗（1678-1735；1722-1735 在位）黃籤的東珠朝珠及朝珠匣，分別保存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和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1 ～圖 1-5）。這五盤東珠朝珠均為標準朝珠形式：以 108 顆母珠組成朝珠身，四等分處各間隔一顆佛頭珠，珠串末端收束處的佛頭珠側接一佛頭塔，並延長緣帶，加飾寶石背雲及大墜角；佛頭塔左右兩側的

6 （清）高宗，《御製文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冊 1305，卷 5，頁 56。感謝王崇齊先生提供資料。

7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卷 1，頁 691-692。

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事錄〉，頁 402-403。

珠間分別附一、二串記念，⁹ 記念由十顆小珠粒及一個小墜角組成。每一盤東珠朝珠都以相同的單蓋木匣盛裝，匣內襯明黃色的暗花團龍紋絹，並設隔板使珠串不相碰撞，方匣長度正好容許珠身順著匣邊擺放，中央置放背雲，兩側為記念，隔板在記念、背雲的接點處均開口以方便串飾通過，空間規劃巧妙合宜，做工規整，由高宗朝宮廷作坊精心設計製作而成。因此根據高宗的說法，東珠朝珠自滿洲建國就已存在，太祖以下朝珠已經傳了五代，至乾隆朝是第六代，648 顆朝珠是 6 盤 108 顆東珠朝珠的總合，象徵代代相傳的帝王譜系。儘管太祖、太宗時期的朝珠樣式和佩帶規範仍處於草創階段（詳後論），不過朝珠作為官方服飾的重要配件已成為定例。

二、從數珠到朝珠：朝珠的正名及其性質

（一）朝珠的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朝珠」一詞在清代早期的文字記錄中並沒有出現。前引《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中關於多爾袞的東珠朝珠，有素珠、數珠的稱法；又前引〈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的小字夾註以「數珠」稱呼皇帝禮服的朝珠：「珠產於盛京東之黑龍江，故名曰東珠，每歲採進者甚夥，是即王氣所鍾，地不愛寶之驗。我朝禮服所御數珠，擇其尤佳者用之，自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世宗五代至朕，珠凡積至六百四十有八。」¹⁰ 這是否意謂清代官方文獻中的朝珠與數珠二者的用語是相通或相等的呢？景聞，〈數珠、念珠與朝珠的定名演變〉一文，整理《清代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承作活計檔》的檔案資料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度藏的文物，歸納出重要的現象。文中指出雍正朝有「念佛裝嚴」數珠和「朝裝嚴」數珠兩類，二者形式的主要差異在於記念、墜角、背雲和珠串的大小。「念佛裝嚴」數珠的記念數量不等，常裝飾有豆、錢幣、蝠等，圈口小，無背雲及墜角，周長約 90 公分左右；「朝裝嚴」數珠的記念是三串的小珠，末端有小墜角，同時還有背雲和大墜角，圈口較大，周長約 150 公分左右。作者並指出「念佛裝嚴」數珠在乾隆九年（1744）之後稱為念珠，「朝裝嚴」數珠在乾隆十年（1745）開始稱為朝珠。¹¹

9 記念，又作計念、記捻，是指珠串上另外附加的小珠串，通常為十顆，掐珠遍一週（108 顆），即撥動一小珠（記子）為記。「記」念，有記錄、或記憶不忘失之意；「計」念，為計算稱念次數；記「捻」，同「掐」，以拇指撥動珠粒的動作。本文採用清代宮廷檔案常見的寫法「記念」。

10（清）高宗，《御製文集》，卷 5，頁 8-9。

11 景聞，〈數珠、念珠與朝珠的定名演變〉，《藝術設計研究》，2016 年 1 期，頁 32-38。

該文論及「朝珠」一詞是從「朝裝嚴數珠」而來的說法，具有說服力。所謂「裝嚴」即「莊嚴」，是指在珠身之間附加記念等小串飾，以增加威儀。雍正朝的數珠樣式因為宗教與政治用途的不同而有「念佛裝嚴」和「朝裝嚴」之別，顯示朝珠一詞出現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朝珠一詞未出現之前，往往以數珠稱之的現象。惟該文談及朝珠名稱出現的時間及其後的發展，仍待商榷，後文再論；關於「念佛裝嚴」數珠發展成「念珠」一詞的推論，亦需進一步考慮。念珠和數珠通常被視為同義詞，廣泛指宗教信仰者用以計算誦念次數的珠串。中國佛教的念珠（數珠）在唐代已普遍流行，¹² 唐代高僧寶思惟（?-721）譯有《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不空（705-774）譯有《金剛頂瑜伽念珠經》，晚唐釋皎然（約 730-約 799）有〈水精數珠歌〉，¹³ 文學家歐陽詹（758-801）有〈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¹⁴ 因此不論是正式的經典名稱或信眾的生活用語，念珠即數珠。「『念佛裝嚴』數珠」的說法是雍正朝宮廷作坊為了區別「『朝裝嚴』數珠」的用語才應運而生，不宜將「『念佛裝嚴』數珠」解釋為「念珠」一詞的源頭。

整理清太祖、太宗及世宗實錄，只有數珠而沒有朝珠一詞（參見表二），康熙朝亦沿襲此習慣用法，如康熙二十七年（1689）八月聖祖親征，駐蹕紅川，喀爾喀部洪俄爾岱青率眾來歸，「上諭曰……朕甚嘉之……上取所帶珊瑚數珠賜之，以示優眷。」¹⁵ 一直到雍正朝初期，即使加飾背雲和墜角的「朝珠」仍稱為數珠，《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元年玉作正月十二日怡親王交東珠數珠一盤，計一百零八顆，隨珊瑚佛頭，松石計念、塔，砵子背雲，夾間珍珠七顆，紅寶石墜角四箇，錦匣盛，奉旨數珠上計念繸子短些收拾，欽此。于二十三日收拾得東珠數珠一盤，打結子，添夾間青金珠八箇，怡親王呈進訖。」¹⁶ 從文字內容分析，這件雍正元年（1723）的數珠是東珠珠身，珊瑚佛頭兩側添青金石夾間珠，還有砵子背雲和紅寶石墜角，儼然就是博物館現存〈世宗御用東珠朝珠〉的形貌（圖 19-1），然而文字紀錄仍作數珠。再如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七日諭軍前回京之將軍官弁及諸大

12 有關念珠的起源、經典、流傳及意涵的演變，參考柯嘉豪、趙悠等譯，《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114-133。

13 （唐）釋皎然，《杼山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1992，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唐三高僧詩》微捲影印），卷 7，頁 17-18。

14 （唐）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平湖葛氏藏明正德本影印），冊 40，卷 3，頁 17-18。

15 《清實錄五·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36，頁 484。

1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玉作〉，頁 93。

臣：「……今朕代皇考推恩，將朕之煖帽、補褂、數珠賜伊（富寧安）穿戴。」¹⁷從整段文字內容推測皇帝賞賜的是成套官服，其中數珠是搭配補褂穿戴之用。以上例子說明朝珠一詞未出現之前都稱為「數珠」。

朝珠一詞的出現要等到雍正朝後期，雍正八年（1730）《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諭行旗務奏議》記載：

八旗都統等議覆據察旗侍衛那齊布……又據奏稱副參領職銜俱係五品，乃僭用朝珠、蟒服、馬項懸纓任意行走，殊屬越分，應請禁止等語。查定例內四品以上官員始准用朝珠、蟒服、馬項懸纓，副參領等官誠為僭越，應照定例不准濫用……奏入於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議。」¹⁸

不只如此，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二十七日陝西總督劉於義的謝恩奉摺，也用了朝珠一詞：「……奉為恭謝天恩事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到皇上賜臣錠藥一大分、香朝珠一盤、香手珠二串、扇子二匣、香袋二匣……」，¹⁹因此早在乾隆十年之前朝珠一詞已經開始使用，《乾隆朝大清會典》與《皇朝禮器圖式》等官書沿用前朝的稱法將朝珠一詞正式納入政書，成為有清一代官方服飾遵循的標準。雍正後期的「『朝裝嚴』數珠」轉換為「朝珠」，專指朝廷參與朝會等場合時佩帶的數珠，是經由正名的方式凸顯宗教傾向的「數珠」在政治層面上的意涵，不僅圈點出二者在樣式形式上的差異，同時有利於朝珠制度化的建構，對於朝珠性質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兼容政治與宗教性質的朝珠

弔詭的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官方修訂成書滿、漢文對照的《御製增訂清文鑑》沒有朝珠一詞，只有數珠（erihe）一詞，檢視宮廷服飾相關的朝衣、朝服、朝褂、朝帶等，都有滿文名稱，²⁰還有朝珠構成的各部份，如數珠子、佛頭、墜角、墜角寶蓋、背雲、背雲繚繫，也都有對應的滿文稱法，意謂「朝珠」這個官方服飾在滿文的使用圈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對應的滿文，一向都以數珠稱之。

17（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4，卷50，頁487-488。

18（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諭行旗務奏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卷8，頁544。

1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1977），23輯，頁120。

20（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3，卷24，頁233、頁239、頁231-232。感謝莊吉發及林士鉉教授協助滿文識讀。

或許因為滿文沒有朝珠一詞，即使朝珠一詞已經出現，清代前期的朝珠用語並沒有完全取代數珠，二者在乾隆朝並存，「朝裝嚴數珠」也還是會被使用。《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二十六日雜活作，……奉旨照六字真言數珠樣仍做念珠一盤，其大西天六字真言數珠照樣准做朝裝嚴數珠一盤欽此。」²¹官方政書偶爾也會看到數珠一詞的用法，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十四年（1749）大學士、學士，同刑部堂官及記注官祇候召入咸常服不掛數珠」²²到了乾隆中期，內務府造辦處的工作記錄仍會見到朝裝嚴或數珠的說法，如《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月初四日金玉作……太監胡世傑交小珍珠一百八顆紅寶石佛頭四個，松石塔一個，金記念三掛，傳旨著按朝裝嚴一樣拴辦，得時在如是室佛上用欽此。於本月二十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小珍珠一百八顆隨佛頭、塔、記念，拴辦得數珠一盤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²³

即便數珠一詞在口語或非正式場合仍然會被使用，不過人們似乎十分清楚禮儀服飾制度中「數珠」的樣式。活動於乾嘉年間的趙翼（1727-1814），撰有《簷曝雜記》云：

數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楠香之類……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為之……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而數珠之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為背雲，下為大垂角……又有佛頭四顆，間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為之。²⁴

趙氏是皇帝身邊的近臣，乾隆十九年（1754）入職軍機處，曾任翰林院編修，四次扈從乾隆皇帝木蘭行獵，²⁵屬於准用朝珠的一群。他晚年歸鄉回憶京城生活的雜記詳細記錄朝珠的材質和形式，記念的數量3串，每串10珠，隔珠4顆，背後的縑帶長，有背雲、大墜角。隨著時間的推移，朝珠一詞使用的比例逐漸提高，道光朝之後以數珠指稱朝珠的情況已十分少見。

從實物的角度來看，念珠和數珠二者的名稱可互通，沒有明確的樣式規範。整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繫有標示念珠、數珠或朝珠字樣黃籤的實物，首先就

2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4，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雜活作〉，頁443。

22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20，卷2，頁71-72。

2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5，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金玉作〉，頁613。

24 （清）趙翼，《簷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4，頁61-62。

25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縣：國史館，1986-1992），卷485，頁11188。趙翼於乾隆十九年入職軍機處，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進士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次扈從乾隆皇帝木蘭行獵，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歸鄉。

數珠與念珠而言，一件舊散斷的珠串附黃籤：「乾隆八年（1743）閏四月二十四日收木數珠一盤，珊瑚佛頭、松石塔、珊瑚青金松石記念三十個、青金松石珊瑚方勝三個、四等正珠豆一箇」，²⁶ 也就是說這盤木數珠有三串記念、一串小飾件。一件繫著「世宗憲皇帝供奉／草珠念珠一盤」黃籤的念珠（圖2），也有珊瑚佛頭、松石塔、30個記念串珠與青金、松石、珊瑚小墜角，還有四等正珠豆或珊瑚豆小串飾。草珠念珠只比木數珠多了一串瑪瑙雙角形小串飾，二者一名為木數珠，一名為草珠念珠，樣式幾乎相同。再看一件註記為木子數珠（圖3）的實物，²⁷ 隔珠有八顆，記念部份除了常見的杵、豆之外，還有銀飾件、銀耳挖等。以上這三盤例子說明宗教性的念珠或數珠作為信徒日常生活中的隨身用品，樣式各隨所好，隔珠、記念的数量和樣式不拘，隔珠兩側也允許附加夾間珠，惟均無背雲，相對來說，朝珠的組成則十分明確。

但是檢視文獻和實物均出現名為「小朝珠」的類型，又說明清王朝似乎並沒有意圖要完全擺脫朝珠的宗教色彩。嘉慶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班禪等為仁宗皇帝昇遐齊集眾喇嘛念經，朝廷「齋賞班禪額爾德尼珊瑚小朝珠一盤……瀧嚨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催生石小朝珠一盤……達賴喇嘛之師榮增班第達之呼畢勒罕金珀小朝珠一盤」²⁸ 整理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附黃籤標示的「小朝珠」如表一，小朝珠的圈口略小，週長約100至160公分之間，大多為伽楠香珠，有些背雲下方繫兩條緜帶、墜角兩個（表一，第13、16項），應是援引念珠可自由調整記念的概念；有些在背雲緜帶上夾間一小金剛杵（表一，第2、3、5、14項，圖21-1）直接添加藏傳佛教的元素。也就是說朝珠在記念、背雲和墜角的原則性規範之外，仍存在小幅度微調的空間，例如在背面的緜帶上增加小金剛杵或多加一墜角。小朝珠收入造辦處的時間集中在乾隆朝晚期，乾隆四十八至五十二年有12件，乾隆十一年、嘉慶八年（1803）、道光十四年（1834）、道光二十三年（1843）各1件，可見小朝珠在乾隆朝早期已經出現，嘉慶之後歷朝仍然存在。總而言之，從「數珠」到「朝裝嚴數珠」再到「朝珠」的用語發展，是在尋求一個能適切傳達「朝珠」樣式與本質的名

2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統一編號：故雜 005297。珠串原傷斷，珠身及佛頭珠4個等零件，均和黃籤上所記載的相同。

27 黃籤：「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初十日收桂元呈覽木子數珠一串，計珠一百箇，珊瑚佛頭七箇，蜜蠟佛頭一箇，青金塔一箇，加間珊瑚珠十四箇，松石豆一箇，珊瑚杵一箇，豆二箇，蜜蠟珠一箇，金星玻璃珠一箇，銀什貳件，銀一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統一編號：故雜 007751。

28 《清實錄三三·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8，頁180-181，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甲子。

稱，而其發展傾向則是越來越偏重政治層面（詳後敘），不過朝珠自始至終都兼容政治與宗教的成分，統治者亦可因需求斟酌調整，是清王朝統治政權兼具宗教性的具體反映。

三、朝珠樣式的確立

學者的研究指出朝珠起源於佛教數珠，根據清高宗的說法，東珠朝珠自滿洲建國就已存在，自太祖以下至乾隆朝已經傳了六代，因此宗教性數珠轉化為政治性朝珠的歷程，正和清王朝借助藏傳佛教統治蒙、藏等族群的歷史進程並行發展。落實到物質的層面來說，朝珠有別於數珠的樣式：三串記念及背雲縵帶的特徵從何而來，一直未被詳細論及，以下試圖從歷史發展的脈絡，檢視清王朝早期與藏傳佛教的互動，如何影響朝珠樣式的形成。

（一）蒙古影響下的「朝珠」

《建州聞見錄》記載努爾哈赤手持念珠接見朝鮮使者一事，常被引用說明滿洲時期太祖已使用「朝珠」，究竟「朝珠」早期的樣式如何？太祖天聰九年（1635）成書的《滿洲實錄》是一部附有插圖的早期實錄，以〈王格張格來貢〉一圖為例（圖 4-1），該頁繪一建築高台，太祖端坐在披著獸皮的交椅上，兩旁護衛手柱傘蓋、豹尾幡侍立，太祖身穿胸前飾團龍的長袍，頭戴毛皮帽，左手置膝上，右手持一串長長的數珠，珠串間夾飾珠徑較大的佛頭珠（圖 4-2）。²⁹《滿洲實錄》的圖繪最早成於太宗天聰九年，康熙版和雍、乾版重修時，依照舊圖重繪，插圖所繪太祖身著朝服，手中數珠描繪仔細，可以視為十八世紀對早期朝珠的理解。³⁰再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太祖朝服畫像〉、〈太宗朝服畫像〉（圖 5）及〈孝惠章皇后朝服畫像〉³¹（圖 6），三幅均為紙本彩繪，尺寸相近，長 55 公分、寬 40 公分。這組早期帝后的畫像，用筆稚拙描繪簡略，用色質樸，很可能是十七世紀所繪製，三位帝后均穿肩飾披領的朝服，皇帝胸前掛著及腰的東珠數珠，間有一顆大型佛頭珠，皇后則

29 《滿洲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頁 107。

30 有關《滿洲實錄》的版本介紹參考，莊吉發，《文獻足徵：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8），頁 5-172。今西春秋譯，《滿和蒙和对訳滿洲實錄》（東京：刀水書房，1992），頁 14-31。

31 任萬平主編、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1·太祖太宗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229；嚴勇主編、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2·順治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171。

左右各斜掛兩串數珠，胸前交叉，或為東珠、珊瑚，珠串亦各有一佛頭珠，反映早期帝后服飾的樣式，具體說明「朝珠」在太祖、太宗時期已是帝后朝服的配件。

就「朝珠」做為服飾制度的配件來看，清王朝官方服飾制定的過程多方採用蒙古樣式已是學界的共識，目前的研究大多針對朝冠和朝服加以討論，朝珠是否也有相同情況呢？讓我們重新觀察經常被用來證明清朝與蒙古服飾關係的內蒙古〈美岱召壁畫〉，這幅〈阿勒坦汗家族禮佛圖〉位於大殿西壁主尊坐佛的下方，北側以阿勒坦汗第三夫人〈三娘子畫像〉（圖 7）為中心，三娘子正面盤坐，頭戴飾紅纓與深色毛皮折檐的暖帽，帽頂嵌寶石，肩前垂髮套，身著黃色大衣，衣緣及衣領顯露出深褐毛皮內裏，胸前戴數珠，手持念珠。再看三娘子左右兩邊盤坐的男、女家族成員，其中右手邊的男子，推測為阿勒坦汗的嫡孫，第三代順義王〈扯力克畫像〉（圖 8-1），扯力克（?-1607）前方四位侍臣合掌盤坐（圖 8-2），頭上戴著褐色斑紋毛皮的折簷暖帽，胸前也戴著數珠。³² 從畫面中觀察這些數珠的樣式，珠串長可及腰，間有佛頭珠分隔，以佛頭塔收束串珠，末端有垂飾收尾，沒有記念。三娘子和侍臣胸前所掛的數珠樣式相同，似乎沒有因階級而有所差別。³³

十七世紀中葉蒙古部族多次覲獻數珠予太宗。天聰後期隨著皇太極向東邊擴張，與蒙古部族接觸頻繁，珊瑚、琥珀、菩提等數珠成為蒙古族進呈禮物清單中常見的一項。整理太宗至世祖實錄記載蒙古族覲獻及賞賜數珠的事件，製成表二「清太宗至世祖數珠覲獻·賞賜表」，清王朝接受數珠覲獻的筆數有 23 筆，賞賜數珠的筆數有 10 筆，收受或贈送禮物的對象為公主、額駙或是蒙古使者，幾乎都來自蒙古族的察哈爾部、土默特部、鄂爾多斯部、喀爾喀部等，和數珠同時作為禮物的項目包含馬、駝、鞍、金銀器、毛皮裘衣和蟒緞等，均為游牧民族重視的珍貴物品。表二第 9、10 項是太宗第二公主許配察哈爾汗子時的聘禮和納吉禮，第 1、7 項是清太宗賞賜給出嫁到蒙古的公主或額駙，顯示在蒙古族數珠影響清王朝服制度的過程中，滿蒙聯姻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表二時間集中在十七世紀中期，西元 1633-1645 年，天聰末和崇德朝，正值滿洲向外擴張的階段，早期太祖的賞賜清單往往是朝衣、韉（靴）、帽、玲瓏帶、弓矢、鞍馬等的組合，幾乎沒有出現數珠，例如：「天命六年辛酉（1621）……八月

32 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張海斌主編，《美岱召壁畫與彩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78-111。

33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醒蒙古數珠樣式無階級差別的現象。

庚午朔戊寅喀爾喀部落以畜產一萬贖貝勒介賽，送其二子一女為質……賜貂鑲朝衣、猓狸裘各一、鞞帽、玲瓏帶、弓矢、雕鞍，并馬一甲百。」³⁴ 太宗朝則有 30 筆和數珠相關的記錄，尤其天聰九年的 5 筆和次年（1636）的 6 筆最為集中，其次為崇德七年（1642）的 4 筆，太宗之後的世祖順治初年僅有 3 筆。值得注意的是，表二第 19 項崇德四年（1639）及第 32 項順治二年（1645），出現賞賜滿洲旗人的例子，仔細核對這些人的身分如表三所示，他們都是滿州八旗，因軍功而得到賞賜。歸納上述，蒙古族的數珠經由饋贈、接納與賞賜的過程，傳播交流，逐漸在滿人貴族間大為流傳，以下這筆崇德六年（1641）訴訟案件的財產清單，更加證明這個現象，這位正白旗旗人圖詹的財產清單計有：

……貂套、貂褂、貂朝衣、狐腋裘、猓狸裘、緞朝衣共七件，緞布共五十二疋，各色緞衣布衣共四箱，銀三千餘兩，赤金十兩，金項圈、簪、鐲等物，及幼女之珍珠、珊瑚等飾，又有銀器及珍珠、琥珀、菩提、藍石等數珠，各色緞、女衣、被褥、緞裙、貂腋、狐腋、灰鼠裘，貂裏女朝衣，並一切箱櫃，所有不知其數……」³⁵

除了擁有銀兩、毛皮朝服、金飾、緞布等之外，圖詹同時擁有珍珠、琥珀、菩提、藍石等數珠，一方面說明旗人的生活漸趨富裕，另一方面也顯示數珠已成為旗人貴重資產中的一項，往往搭配衣裝穿戴，相較於太祖時期，太宗崇德年間（1636-1643）「朝珠」已成為旗人服飾常見的配件。

表二起首的第 1 項是太宗賞賜額駙、公主，說明早在與蒙古族接觸之前，佛教意涵的數珠已是滿人的生活用品。研究指出，雖然薩滿信仰是滿人或女真人主要的宗教信仰，不過佛教也同時影響他們的意識形態。³⁶ 十二世紀女真人所建的金代已接受佛教信仰，永寧寺是遼東一帶的佛教名寺；十四、十五世紀有廣祐寺高僧道圓（1375-1442），德行高操，弟子四十餘人為遼東各寺廟的住持；又，明王朝於永樂十五年（1417）在遼東設立建州衛僧綱司管理佛教事務，以女真僧人搭兒馬班為僧綱，³⁷ 因此，十二世紀以來佛教一直是女真人信仰生活中的一部份，而且將佛教元素與政治連結作為統治權力的象徵，也是女真人原有的文化傳統。萬曆二十四

34 《清實錄一·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8，頁 9。

35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5，頁 730。

36 唐均，〈從母語文字記載看女真人的多元宗教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3 卷 1 期（2012.1），頁 53-60。

37 趙毅、劉慶宇，〈清建國前女真人之佛教信仰〉，《史學月刊》，2008 年 9 期，頁 29-35。

年（1596）朝鮮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在赫圖阿拉城面見努爾哈赤時描述太祖身著鑲貂皮的五綵龍文袍，腰繫銀入絲金帶，頭戴貂皮護耳帽，帽前飾銀造蓮花台人形像；³⁸ 萬曆四十一年（1613）努爾哈赤還把自己所戴的「鑲嵌三粒東珠金佛暖帽」賞賜烏蘇城的降臣，³⁹ 以上文字描述的「蓮花台上的金嵌東珠坐佛」帽子飾件，正是後來清代皇帝朝冠上裝飾「冠前金佛」的前身。因此，在滿洲向外擴張的時期，將蒙古的佛教數珠轉化為官方的服飾配件，既可取得蒙古族的認同與信任，又遵循女真既有的習俗與文化，無疑是一項十分合理又明智的作法。

（二）西藏影響下的「朝珠」

如果蒙古族〈阿勒坦汗家族禮佛圖〉的數珠是早期「朝珠」樣式的假設可以成立，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朝珠樣式產生變化呢？學者藉由順治朝太后及帝后畫像，認為順治朝後期是「朝珠」發展的重要關鍵，⁴⁰ 為了說明這個時間點的特殊意義，並且進一步探究朝珠變化的軌跡，本文嘗試從歷史的角度探究西藏對清代宮廷朝珠樣式的影響。早期清王朝與佛教的接觸主要透過蒙古，隨著帝國的擴建，由於蒙古各部崇信達賴喇嘛，因此太宗希望透過與西藏的直接接觸，以爭取蒙古喀爾喀等部的信服。太祖與太宗偶有藏地貴族來往奉貢，一直到世祖才有機會迎接五世達賴喇嘛到北京。⁴¹ 順治九年（1652）五世達賴來京之後，雙方交流轉趨頻繁，《皇朝文獻通考》：「崇德七年達賴喇嘛首先入貢，至順治九年來朝，十年（1653）世祖章皇帝賜以印，遣使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幹齊喇達喇達賴喇嘛，嗣後與班禪喇嘛各遣使貢獻不絕。」⁴² 順治十年西寧瞿曇寺國師貢舍利藏、菩提數珠、琥珀、氈氊、狫狫孫皮、狼皮、狐皮、酥皮。⁴³ 同年西寧西納演教寺國師貢舍利、琥珀數珠、青金石數珠、菩提數珠、花毯、西域氈氈、腰刀、狫狫孫皮、艾葉豹

38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收入《清史資料（第三輯）》（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9），頁21-23。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3-26。

40 樸文英，〈清代的朝珠與數珠〉，頁59-60。樂曄，〈試論沈陽故宮博物院院藏朝珠〉，頁118-121。

41 郭美蘭，〈五世達賴喇嘛入覲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2期，頁33-41；馮智，〈五世達賴喇嘛入覲——兼論清順治至乾隆朝冊封達賴喇嘛的問題〉，《普門學報》，22期（2004.7），頁1-22。達力扎布，〈清太宗邀請五世達賴喇嘛史實考略〉，《中國藏學》，83期（2008.3），頁72-81。

42（清）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32-638，卷292，頁28。有關金印印文內容，據《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74，頁586，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

43（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43，頁21。

皮、金錢豹皮、狼皮、狐皮、馬、牛、酥油諸物。⁴⁴可見順治後期以來，數珠為宮廷與藏地接觸時常見的貢物。

《大清會典則例》記載，喇嘛進貢的貢物有「壽帕、銅佛、舍利、珊瑚琥珀數珠、藏香、氍毹之屬」。⁴⁵故宮博物院典藏清代藏地入貢的數珠數量眾多，其樣式均十分接近，⁴⁶可作為藏地進貢數珠樣式的參考。以嘉慶十一年（1796）收入內務府造辦處收入的〈珊瑚數珠〉⁴⁷為例，（圖 11）數珠附黃籤註記：「嘉慶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收王進福交珊瑚數珠一串計一百十五箇」，珊瑚數珠有珠 115 個，珠徑 1.1 至 1.9 公分，周長約 148 公分，珠串間有記念三個。⁴⁸記念以一長形的紙捲製成，上面包覆綠、黃、紅三色線纏繞成的方格紋，末端垂著線墜，三個記念的尺寸和樣式均相同。珠粒的品質並不均一，記念的製作方式及用材亦樸素簡單，是西藏的地方工藝品。

附小記念樣式的西藏數珠，至少在十五世紀已有。十五世紀的明代宮廷崇尚藏傳佛教，修建佛寺，迎請西藏僧人如大慈法王釋迦也失（1354-1439）、大智法王班丹扎釋（1377-?）等入宮，在北京、南京等地設壇場，在五台山駐錫說法，影響所及，當時社會上修習密法的人數甚夥，法器需求眾多。⁴⁹2001 年發掘湖北荊門的明代梁莊王（1411-1441）與魏妃合葬墓，出土文物 5300 餘件，親王的棺床上有一件法器漆匣，內貯放明王像、呪牌等藏傳佛像附件及數珠（念珠）八串，其中一串水晶數珠（圖 9），珠 108 顆，小記念四串，各以十粒小珠組成，末端收束處以九顆小珠為墜飾。⁵⁰數珠是宗教生活的日常用品，蒙、藏的數珠樣式或許因為各地風土習慣使然，略有不同，以清代乾隆元年（1736）三世章嘉送給皇帝的鳳眼菩提念珠

44（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43，頁 22。

45（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 142，頁 74。

46 參考賴依縵，〈晚清西藏入貢僧俗考——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半寶石數珠進貢者為例〉，《漢學研究》，37 卷 1 期（2019.3），頁 151-194。

47 珊瑚數珠附宮廷註記的黃籤：「嘉慶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收王進福交珊瑚數珠一串計一百十五箇」。

48 三個記念都是另外繫於珠串穿繩上，沒有收束匯集珠串末端的功能，由於數珠拍攝時放置的方式容易引起誤解，特別附註說明。

49 陳楠，〈明代法王釋迦也失在北京活動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 卷 4 期（2004.4），頁 91-97；謝繼勝、賈維維，〈元明清北京藏傳佛教藝術的形成與發展〉，《中國藏學》31 卷 4 期（2011.1），頁 149-161；陳楠，〈釋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與明成祖關係史實考述〉，《西藏研究》，2004 年 3 期，頁 99-106。

5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梁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84-198。

(圖 10)⁵¹ 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呈進的嘎布拉念珠(圖 11)⁵² 為例，前者僅二串小記念，一拴蚌珠一繫茶晶豆，樣式樸素；後者的記念六串，繫縑或長或短，有金剛杵、松石、蚌珠等多樣小飾物，配色鮮明，這種差異與經典無關，也不影響數珠的精神內涵。

整體觀之，明代水晶數珠(圖 9)及清代藏地進貢數珠(圖 12)均飾記念若干串，記念大致均等長，順治朝〈孝莊皇太后便服像〉皇太后(1613-1688)手中的數珠也相同。(圖 13-2) 太后所持數珠的材質與做工講究，透露數珠主人尊貴的身分，其樣式不同於前引圖 9、12 二者之處在於三串記念分置佛頭塔兩側，呈一串及二串的配置方式，正和朝珠記念的作法相同，而且佛頭塔縑繫亦飾寶石與墜角，除了寶石的尺寸較小、縑繫較短之外，幾乎就是一盤朝珠。順治朝後期這種數珠的新作風在康熙朝仍然可以見到，一件繫著「聖祖」白籤條的茶晶念珠(圖 14)，附三串記念，以一、二串的組合分別置於佛頭塔兩側的珠間，每串記念以十小珠組成，若不是縑繫較短，又沒有背雲、大墜角，與朝珠幾無二致。順治後期以來數珠的新樣式，由於朝珠源於數珠的關聯性，極可能意謂同時間的朝珠也有相同作法，出現附三串記念和背雲寶石的朝珠新風貌。

接下來讓我們直接觀察現存的御用東珠朝珠，就背雲、墜角與夾間珠的作法，探究朝珠樣式的完成。根據背雲寶石鑲嵌的工藝，將清代五盤皇帝御用東珠朝珠分為兩組，I 式太祖、太宗朝珠(圖 15-1、16-1)，II 式世祖、聖祖、世宗朝珠(圖 17-1、18-1、19-1)，並且以仁宗(1760-1820；1796-1820 在位)朝珠作為參考對照組。I 式太祖御用朝珠的藍寶石背雲(圖 15-2)，側面以寬 0.2、厚 0.2 公分的金框固定，正面視之寶石牢牢的鑲嵌在寬厚的唐草紋縑絲金框內，強調金邊框的裝飾功能。另一件太宗御用朝珠背雲的矸子，呈半球形，最厚處達 1.3 公分，背面以金板固定，正面套飾一外環寬 0.6 公分的外框與鏤空花形背板。(圖 16-2、16-3) II 式背雲鑲飾寶石的作法則是將寶石金片包覆的部份減至最少，世祖御用東珠朝珠的背雲(圖 17-2)，無金片包覆；聖祖及世宗的背雲矸子，(圖 18-2、19-2) 側面雖以金片包覆固定，正面視之，只見薄薄的一層金邊，聖祖朝珠背雲飾以連續三角形細金

51 據數珠上所繫清宮留存的黃色籤條：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章嘉胡圖克圖進，鳳眼菩提數珠一盤，珊瑚佛頭塔、上拴蚌珠一顆、茶晶豆一箇。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 62。

52 附題識：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班禪額爾德呢恭進嘎布拉念珠一盤。陳慧霞，《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72。

邊，益顯精緻。整體視之，I 式背雲均留有外框，以穩重厚實取勝，II 式將邊框減至最少，使寶石相形俐落。

I 式背雲和十八世紀中、後期朝珠背雲的做法較為接近。以嘉慶朝清仁宗御用〈東珠朝珠〉為例，(圖 20-1、20-2) 背雲為粉紅碧璽，側面以銀鍍金片包覆，邊框上飾點翠如意雲紋，這種做法在乾隆後期已經出現。乾隆四十八年(1783) 收入造辦處的〈伽楠香小朝珠〉，(圖 21-1、21-2，表一第 2 項) 佛頭塔下為一金剛杵，繚帶中央的紅色寶石背雲鑲在點翠鏤空銀飾框內。再看乾隆十一年造辦處收入的〈金珀小朝珠〉(圖 22-1、22-2，表一第 1 項)，鑲麵松(即綠松石)的背雲兩端各以一片爪狀的金屬抓住，充分展現背雲的渾圓，不受邊框的拘束。乾隆初期、雍正和康熙朝的朝珠背雲大多無寬緣，乾隆中、後期一直到嘉慶朝則偏好在背雲外圍加上框飾。透過背雲鑲嵌工藝的差異推論 I 式太祖、太宗朝珠的背雲極可能是乾隆朝時重新添加。

再就記念小墜角的金寶蓋部份，I 式太祖、太宗和 II 式聖祖、世宗朝珠均為喇叭狀的纒絲金寶蓋，和仁宗的相同，只有世祖朝珠的金寶蓋略呈葫蘆狀，以金片成型無纒絲。又，佛頭珠兩側的夾間珠，I 式太祖、太宗及 II 式聖祖、世宗朝珠的四顆佛頭珠兩側，均加飾青金石或綠松石夾間珠，和仁宗朝珠相同(圖 15-3、16-3、18-3、19-3、20-3)，只有世祖朝珠的佛頭珠兩側沒有加飾夾間珠(圖 17-3)。歸納上述現象，整理如表四，推測 I 式太祖、太宗御用朝珠很可能經過十八世紀乾隆朝的改裝新增，將東珠珠身部份重串，在佛頭珠兩側加上夾間珠和記念，並加上背雲繚繫；而世祖御用朝珠，除了大墜角原已脫落外，背雲和記念部份極可能保留順治朝後期的原組件，這個現象正足以說明順治後期朝珠的樣式已經確立，不僅有三串記念而且已加上背雲，反過來說，順治後期之前的太祖、太宗朝珠，很可能只有佛頭珠，沒有記念、背雲與大、小墜角，朝珠樣式接近前敘太祖、太宗畫像(圖 5)的形貌。

清王朝早期採用蒙古數珠的概念與形式，將數珠納入官方服飾的一部份，從表二第 1、7 條太祖賞賜公主數珠的例子看來，天聰年間皇室家族已有佩帶數珠的習慣，再就表二第 11、13 及 19 條太宗賞賜貝勒、戰功旗人等數珠的記錄，崇德年間滿洲貴族已掛數珠。順治朝入關以後，清王朝的統治對象除信仰藏傳佛教的蒙、藏族之外，還要面對以儒家文化為主要背景的漢族，在兼顧數珠的宗教性原則下，將數珠加上固定數量與式樣的記念，延長繚帶並繫以背雲和大墜角，藉由制度化的樣

式規範，賦予數珠另一層政治意涵，成為清王朝統治者極具民族特色的官方服飾配件。

表四 五帝御用東珠朝珠細部樣式比較表

項目／皇帝別	(參考組) 仁宗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	世宗
背雲樣式	I 式	I 式	I 式	II 式	II 式	II 式
記念小墜角的金寶蓋	縷絲	縷絲	縷絲	金片	縷絲	縷絲
佛頭珠兩側的夾間珠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四、朝珠的佩帶及其意涵

朝珠不只是皇帝使用，百官亦佩帶朝珠。清王朝官方服飾制度主要以帽頂寶石和補子分別等級，親王宗室和九品職官帽頂裝飾帽花各有對應的種類、數量，補服各有不同的動物紋飾與服色。相對來看，朝珠等級的規定則單純許多，主要根據縷帶的顏色：明黃、金黃和石青三種，帝后用明黃色，皇子、親王、世子、郡王用金黃色，貝勒以下、民公、侯等餘皆用石青色。⁵³ 至於朝珠本身的質材，除了東珠朝珠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的專屬，再細分後列二位只能使用三等東珠之外，⁵⁴ 其餘的佩帶者「珊瑚、松石、青金石、蜜珀隨所用，珍寶雜飾，各惟其宜。」⁵⁵

觀察服制實際穿戴時的情況，朝珠縷帶的顏色十分接近朝服或補服的顏色，而且縷帶不在胸前而是垂掛在人們的身背，因此以縷帶顏色分別等級並沒有積極的鑑別功能，反而是最引人注目的 108 顆珠粒，卻沒有材質和顏色的規範。這個現象正呼應前引清高宗御製文〈端凝殿恭藏列祖御用朝珠記〉談到朝珠的定位：「我國家……仍尊舊制衣冠，加之黼黻，賁以朝珠。」所謂「賁以朝珠」的「賁」是「盛

53 (清)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6，卷 4，頁 230；卷 5，頁 248。

54 (清) 清高宗，《國朝宮史·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57，卷 9，頁 147-150。

55 惟一規範的是後宮妃嬪著朝服戴時的三盤朝珠，早些成書的《國朝宮史》以東珠、珍珠和珊瑚為主，青金石、琥珀為輔，材質的種類較多，《皇朝禮器圖式》則是以東珠、蜜珀和珊瑚為主，交互組合，等級劃分較為清晰。妃嬪著吉服時的一盤朝珠，沒有材質的規範。參見(清) 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卷 6，頁 636-683。乾隆七年敕撰、二十四年增修的《國朝宮史·乾隆朝》，卷 9，頁 147-150。

裝」的意思，指朝珠的用意在於使服飾顯得更為隆重，換句話說，朝珠是為了增加光采的配件，因此從官方服飾的立場考量，朝珠的重點不在於材質是珊瑚或琥珀等等，而在於有或沒有掛朝珠的分別，那麼誰可以掛朝珠呢？

於官員准用朝珠的規定，學者的研究多半引用《大清會典》的記載：

凡朝珠，王以下，文職五品、武職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公主、福晉以下，五品官命婦以上，均得以雜寶及諸香為之。禮部主事，太常寺博士、典簿、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除在壇廟執事及殿庭侍儀外，餘處不准用珠系及佩囊。⁵⁶

乾隆五十二年（1787）成書《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乾隆朝》，還提到侍衛、批本處、奏事處、軍機處行走人員、內務府主事，准用朝珠。⁵⁷ 這是乾隆朝將之前歷位皇帝累積的相關規範條理化與制度化後的陳述，本文嘗試回溯歷史長流，透過分析規範內容的發展脈絡，觀察佩帶朝珠群體的變化，思考統治者如何決定誰可以掛朝珠，藉此以呈顯朝珠所代表的意義。以下依照時間先後整理表五「准用朝珠人員相關條文表」。

表五 准用朝珠人員相關條文表

序號	時間	對象	條文內容	出典
1	順治九年 (1652)	閒散宗室	題準閒散宗室服用蟒段、緞段、倭段、金花段及各種花素段，衣裾四啟，得掛數珠、馬繫繫纓，得用青段坐褥襯白。	《太宗實錄》卷 47， 頁 22 《會典則例》卷 65， 頁 160
2	康熙三年 (1667)	文官四品以上	題准文官四品以上用蟒段、懸數珠、馬繫繫纓，五品以下不得用。	《會典則例》卷 65， 頁 108
3	雍正三年 (1725)	內大臣侍衛	入朝均掛數珠。	《會典則例》卷 170，頁 423
4	雍正七年 (1729)	御醫	定御醫均授七品，許用六品冠帶、掛數珠。	《會典則例》卷 158，頁 39

56 《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9，卷 30，頁 244。

57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35，卷 141，頁 127。

5	乾隆二年 (1737)	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	癸巳令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俱懸帶數珠。諭曰：朕御門聽政之時，翰林院修撰、編修與科道一同侍班，翰林班次在科道之上，科道懸帶數珠而翰林未有定制，朕思侍從之臣理應畫一，嗣後修撰、編修亦著一體懸帶數珠，以肅朝儀。	《皇朝通考》卷128，頁793
6	乾隆四年 (1739)	禮部司官、主事、司務	准禮部司官、主事、司務，均有監禮察班等職事，令其一例用朝珠，以肅威儀。	《會典則例》卷65，頁174
7	乾隆五年 (1740)	准禮部主事、司務、行人，太常寺博士、典簿、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	奏准禮部主事、司務、行人，太常寺博士、典簿、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光祿寺署正、署丞、典簿，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惟在壇廟執事及殿庭侍儀准掛朝珠，平時燕處及在公署均不得用，違者科道指名參奏，照違制例議處。	《會典則例》卷65，頁415-416。 ⁵⁸
8	乾隆十一年 (1746)	內務府總管等及六品以上首領太監	閏三月初三日上諭：嗣後爾總管等及六品以上首領太監隨朕出城進城，許帶數珠、馬掛踢胸，七、八品首領太監俱不得用，惟穿補服日期，准帶數珠，馬仍不許掛踢胸。	《國朝宮史》卷4，頁48
9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軍機處行走、章京筆帖式	三月丁未，諭軍機處行走、章京、筆帖式皆係終日內廷供職，著加恩賞掛朝珠，嗣後凡不應掛朝珠官員挑在軍機處行走，亦照此例。	《乾隆實錄》卷583，頁462
10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批本處、奏事處	凡文六品以下除翰詹等官、批本、奏事、軍機處行走人員、內務府主事外，武五品以下除侍衛外，不得用朝珠。	《皇朝通考》卷141，頁127
附註：《會典則例》：《大清會典則例》，《皇朝通考》：《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乾隆朝》。				

58 相同內容又見於《大清會典則例》冊620，卷20，頁415-416，文字略有差異。「奏准京官、禮部、司務，太常博士、典簿、讀祝官、贊禮郎，鴻臚寺鳴贊，光祿寺署正、署丞，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恭遇壇廟執事及殿庭侍儀之時，准其懸掛數珠，其平常在署仍

准用朝珠的人員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國家重臣，早期以滿族貴族為主，康熙朝初年納入四品以上的文官。表五第 1 條，順治九年允許閒散宗室掛朝珠，由此推測，在此之前，朝珠已是有爵位宗室的佩飾。前引《大清會典》記載「王以下……公主、福晉以下」，亦即指皇室家族及戰功受封的滿族貴族，這些成員是帝國建立初期的權力核心，⁵⁹ 也是最早掛「朝珠」的群體。表五第 2 條是康熙三年（1657）文四品以上得用數珠，前引《大清會典》記載「文職五品、武職四品以上」，清代官制九品，一品至三品的官員是中央主要部門的主、副官和省級地方的文武官員，四品官屬於中等偏上的職位，相當於國家高級主管。武五品再加上康熙三年四品文官的納入，意謂康熙朝初期朝珠佩帶的制度已逐步與中央官制結合，使朝珠成為國家重要官吏的識別標誌。

第二類准用朝珠的是不受品級限制的皇帝近臣與「肅威儀」考量下參與儀典時的禮部成員。先是表五第 3、4 條雍正年間的內大臣侍衛、御醫是皇帝身邊的安全護衛及醫療人員，表五第 8 條乾隆十一年加入內務府的總管及首領太監，他們是皇帝的管家，這些官員雖然品級不高，因為是皇帝近臣，准用朝珠。表五第 5 條乾隆二年（1737）因科道官帶朝珠已成定制，故諭令供職於翰林院的修撰等六品以下職官准掛朝珠。科道官是都察院所屬六科十五道的職官，職掌題本的抄發、稽查、注銷文卷等，有建白、參劾百官之責，還要擔任皇帝聽政、經筵的侍班，朝會的糾儀可說是皇帝的耳目。⁶⁰ 翰林院是科舉制度頂尖人才匯集之地，職掌撰述文史、繕寫諭旨、起草誥敕、皇子宗室的教育，是皇帝的文學侍從。⁶¹ 二者同時參與常朝之一的御門聽政，在皇帝與大臣處理政務的場合，以皇帝侍從之臣的身分而准掛朝珠。

再為表五第 6、7 條，乾隆四年（1739）及五年（1740）准禮部六品以下的基層事務官員，參與祭祀、殿庭等儀禮時，為了「肅威儀」故，准用朝珠。禮部掌管五禮：吉、凶、賓、軍、嘉禮的事宜，五禮以吉禮為首，祭祀天地神鬼，象徵皇權來自天命與祖靈；凶、賓、軍、嘉四項主要處理帝王統治下的人間事務，喪葬、賓客、軍旅與冠婚之事。禮部儀禮的重點在於安定天人秩序，皇帝作為天子，是天與人之間的媒介，代表人民參與天地秩序的運行，上以承天命，下以行教化，使人民

按會典定制遵行不得越分擅用，如有常無事之曰懸掛數珠者，一經科道察參，照違制律議處。」

59 葉高樹，〈滿族貴族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3 期（2010.6），頁 173-230。

60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 97-126；張德澤，《清朝國家機關考略》（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22-130。

61 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160-196。

在安定的秩序中生活與生產。⁶² 儀禮的「威儀」是強調儀式的重要性，也是身體儀態所展示的神聖意義，⁶³ 由於參與儀禮的基層官員負責使整個儀式順利進行，因此特別准許這些工作人員掛朝珠，這不僅代表對儀式本身的重視，同時標示「執事者協助皇帝完成天子職務」這項任務的神聖性。換個角度看，禮部舉行的各項儀典攸關的是皇帝的統治權，參與禮儀人員藉准用朝珠的特例，形成一以皇帝為中心的祭祀群體。

表五第 9、10 條乾隆二十四（1759）、四十一年諭令軍機處、批本處與奏事處的行走等六品以下承辦文書事務的官員，因於內廷供職故，「加恩賞掛朝珠」。乾隆年間的軍機處是辦理軍政大事的核心機構，位於內廷，是皇帝身邊的重要助手。筆帖式是中央各部院負責翻譯滿漢章奏文字等文書工作的儲備官職，⁶⁴ 行走是允許出入該機構辦事的臨時人員，多以原官兼職，沒有品級。軍機處的行走和章京是由各部院選調兼任，皇帝親自決定任用，他們輪班隨侍皇帝左右，專司文件收發、繕寫詔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等工作，職掌繁雜，仰承皇帝旨意辦理事務，官秩不高但地位重要。⁶⁵ 乾隆四十一年提到的批本處是內閣所屬機構，奏事處由御前大臣兼管，⁶⁶ 前者專掌轉呈本章和批本，⁶⁷ 後者掌管傳遞奏折題本貢物等應進事件奏、傳宣諭旨及安排在朝值班與接見事宜。⁶⁸

乾隆年間新增不受品級限制而准用朝珠的官員，他們或內廷供職或為侍從之臣，包括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軍機處行走、章京、筆帖式等。學者從「內廷行走」探討清代內廷與外朝的關係指出，清代外朝地位下降，內廷成為權力核心，朝政日趨內廷化，外朝機構有內廷化趨勢，朝臣的身分本質逐漸轉變為皇帝的近臣、近侍。「內廷行走」的核心官員為內廷諸王、內廷翰林、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他們日值內廷隨侍皇帝左右，職事類別為文學侍從、講論時事與處理朝政。⁶⁹ 從官方服飾的角度來看，內廷化與近侍化的官員是以原官兼職，服飾制度按原官品級，但是准掛朝珠是由皇帝特別許可，不受品級限制，也就是說朝珠成為皇帝身邊

62 甘懷真，《儀禮·君權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版中心，2003），頁 81-118。

63 甘懷真，《儀禮·君權與經典詮釋》，頁 10-33。

64 馬仁杰、黃偉，〈清代檔案管理機構及其人員考略〉，《檔案學通訊》，2014 年 1 期，頁 97-101。

65 李鵬年，《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頁 59-65。

66 李鵬年，《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頁 35-36。

67 楊劍宇，《中國秘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46-285。

68 李鵬年，《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頁 83-86。

69 祁美琴，〈從清代「內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傾向〉，《清史研究》，2016 年 2 期，頁 1-25。

重要官員的符號。

綜合上述，可以說朝珠所圈劃出來的是一個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世界。清王朝早期以國家重要官員為主體，從皇室、滿族貴族逐漸擴大到中上品級的文武官員；雍正初年以後，紫禁城內與皇帝生活或文書相關的基層職官，以朝珠為符碼，環繞在皇帝四周；乾隆初年以後，隨著朝臣的內廷化與近侍化，朝珠成為隨侍皇帝大臣必備的配飾，這時候朝珠已超越品級的概念，成為皇帝親信的象徵。再加上禮部參與典儀人員，均須整齊劃一的掛朝珠，進一步傳達出佩帶朝珠與皇權、皇帝個人及其治術的密切連結，是以朝珠為符號圈劃出一個高度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世界。

五、結語

朝珠雖然只是官方服飾中的一個配件，卻具體而微的反映清王朝統治的特質。朝珠自始至終都兼具宗教與政治的色彩，朝珠樣式的演變更充分展現統治者如何駕馭宗教與政治的象徵元素。朝珠早期受到蒙古數珠的影響，宗教性高於政治性，朝珠的樣式為朝珠身之間加佛頭珠，和宗教性的數珠沒有明顯的差異。清王朝入關取代明王朝統治漢民族之後，隨著帝國規模的建立，服飾制度的漸趨完備和常朝儀注的制定，⁷⁰遂援引西藏藏傳佛教數珠的形式，增飾記念三串，確立朝珠的基本形制，尤其是背雲的添加，藉由與數珠些微卻又明顯的樣式區別，為朝珠注入鮮明的政治色彩；雍正朝的朝珠正名，則是進一步為朝珠的政治身分取得名實相符的地位。

朝珠與皇權的關係，不僅因為只有皇帝可以佩帶東珠朝珠代表皇權至上，更重要的是朝珠群體的建立。在統治者有意識地挑選朝珠佩帶者的過程中，首先建立中上品級官員掛朝珠的規範，隨後又逐漸擺脫官制的束縛，一以皇帝為中心，擔任皇帝侍從或近臣成為關鍵身分，這些准用朝珠的群體超越官方服飾的品級限制，是朝珠高度政治化的具體表現；東珠朝珠在朝珠群體的圍繞烘托下，更突顯其崇高至尊的地位。

參考乾隆二十一年（1756）及咸豐四年（1854）的皇帝穿戴檔，重要儀禮大典，如祭祀穀壇、社稷壇、先農壇、方澤壇、夕月壇、圓丘壇和太廟，往往佩掛東

70 《清實錄二·太宗文皇帝實錄》，卷12，頁175。

珠朝珠，⁷¹關於皇帝朝珠的樣式，乾隆朝的《皇朝禮器圖式》云：「謹按本朝定制，皇帝朝珠用東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大典禮御之。」明文定義東珠朝珠的超越性地位，接著又談到皇帝郊祭壇廟時的朝珠云：「惟祀天以青金石為飾，祀地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綠松石」，⁷²高宗以四色寶石朝珠祭祀天地日月的構想是在既有皇帝祭服顏色規範下，再往前推進一步的作法。先是康熙二十二年（1676）定大典禮及祭壇廟禮服用黃色、秋香色、藍色，雍正元年（1736）定「祭服用天青、明黃、大紅、月白四色。」⁷³就國家的角度而言，祭祀者及其服用與祭祀對象相對應，猶如明嘉靖九年（1530）定祭祀四郊瓷器的顏色，「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⁷⁴乃是承襲自漢代以來儒家以天子在皇家祭祀禮儀中擔任天人之間中介者的觀念，⁷⁵清代帝王透過祭器、祭服與朝珠的顏色和天地日月相互感應，正是以禮治國的理想性呈現，而朝珠扮演的的神聖任務，正是協助皇帝取得帝國傳承相應於天地運行的正當性與道德性。

〔後記〕本文初稿曾於2019年8月22至23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皇朝禮器圖式》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會議期間承蒙主辦人賴惠敏教授、賴毓芝教授的鼓勵，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以及期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細心與耐心的指正，謹致上由衷的謝意。

7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廿一年穿戴檔》，收入《圓明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下冊，頁827-911。乾隆二十一年全年含閏月共393天，除出熱河行宮、木蘭園場66日，曲阜54日外，宮中105日，圓明園168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四年穿戴檔》，收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5輯，頁232-322。

72（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卷4，頁200。

73（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65，頁156。

74（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明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冊5，卷201，頁2715。

75 甘懷真，《儀禮·君權與經典詮釋》，頁35-80。

表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小朝珠整理

序號	時間	品名	組成(據黃籤註記)	直徑長	藏品編號
1	乾隆十一年 (1746)十二月十五日收	金珀小朝珠	翠生石佛頭,珊瑚塔,麩松背雲、墜角,珊瑚記念,少墜角一个	70.2公分	故雜 007679
2	乾隆四十八年 (1783)二月初四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計念,紅寶石背雲、小墜角,色暗驚瑩二等正珠大墜角,銀鍍金杵一個,加間米珠四顆	86公分	故雜 003262
3	乾隆四十八年 二月初四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綠玉背雲、小墜角,璧珖么大墜角,銀鍍金杵一箇,加間米珠四顆	63.5公分	故雜 005277
4	乾隆五十二年 (1787)十二月二十五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碧珖么背雲、大墜角,青石小墜角,加間碎小正珠一顆、米珠三顆	75.8公分	故雜 003287
5	乾隆五十五年 (1790)十月十六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碧珖么佛頭塔,銀鑲碧珖么背雲、大墜角,金杵一箇,松石記念,碧珖么小墜角,加間碎小正珠四顆	84公分	故雜 005285
6	乾隆五十六年 (1791)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碧珖么佛頭塔,珊瑚記念,綠玉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53公分	故雜 005278
7	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璧珖么佛頭塔,珊瑚記念,綠玉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53公分	故雜 005279
8	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碧珖么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54公分	故雜 005281
9	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碧珖么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54公分	故雜 005282
10	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碧珖么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75.5公分	故雜 005283
11	乾隆五十六年 五月初三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碧珖么佛頭塔,珊瑚記念,綠玉背雲、大小墜角,加間米珠四顆	76公分	故雜 005284
12	乾隆五十八年 (1793)十一月初六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綠苗石佛頭塔,摧生石背雲、大小墜角,珊瑚記念,加間假珠四顆	傷斷	故雜 005288
13	嘉慶八年 (1803)六月二十八日收	伽楠香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銅鑲紅寶石背雲、墜角二箇,綠玉小墜角,加間米珠五顆	傷斷	故雜 005287

14	道光十四年 (1834)五月 十三日收	孔雀石 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記念、碧玊么背云、大小 墜角，加間瑪瑙杵一個	(缺)	故雜 005294
15	道光二十三年 (1843)閏七 月初六日收	珊瑚小 朝珠	松石佛頭塔，碎小正珠計念，青金大墜 角，碧玊么小墜角，加間珊瑚豆一箇	(缺)	故雜 003267
16	(缺)	伽楠香 小朝珠	珊瑚佛頭塔、計念，銅扁紅寶石背云、 墜角二个，綠玉小墜角，加間米朱五顆	傷斷	故雜 005306

表二 清太宗至世祖數珠觀獻·賞賜表⁷⁶

序號	時間	觀獻者	賞賜對象	禮物清單	出處
1	天聰七年 (1633)六月 己亥		賜額駙滿朱習 禮及公主	嵌東珠珍珠耳墜、項圈、手鐲、 足鐲、各種數珠、各色衣服、 帽、鞞、被褥、枕、帳、幔、繖、 各色鞍轡、金銀器皿、隨媵女 子、服役男婦、帳、床、車、 涼棚、駝馬，諸用物甚厚	二 14： 199
2	天聰八年 (1634)六月 辛亥	多爾濟塔蘇爾海 之母具酒餚來獻		進雕鞍、馬、駝、貂裘、銀器、 珊瑚數珠等物，酌納之	二 19： 249
3	天聰八年七 月乙酉	土巴濟農下蘇默 爾代旺台吉		進獻貂裘、琥珀數珠、馬、駝	二 19： 250
4	天聰八年閏 八月辛丑	管高爾土門固山 事察哈爾汗福金 來謁上		獻金銀器、雕鞍、貂鑲朝衣、 琥珀珍珠數珠，酌納之	二 20： 264
5	天聰九年 (1635)三月 癸酉	察哈爾巴賴都爾 等		各獻黃金、駝、馬及珊瑚、菩 提數珠，金器等物，酌納之	二 23： 300
6	天聰九年五 月丙子	察哈爾蘇泰太 后、額哲設宴		送雕駝、馬、雕鞍、貂裘、琥 珀數珠、金銀、綵緞等物，却 其駝馬，餘悉納之	二 23： 304

76 本表出處，「二」指《清實錄二·太宗文皇帝實錄》，「三」指《清實錄三·世祖章皇帝實錄》，卷數及頁數詳下。

7	天聰九年八月乙亥		額駙班第公主將歸	以嵌東珠、珍珠珍珠、金耳墜、項圈、手鐲、足鐲、各種數珠、各色衣裳、韉、綵緞、文綺、金銀器皿、並一切箱櫃、磁器等物，厚賜之	二 25： 320
8	天聰九年九月乙亥	察哈爾汗蘇泰太后及其子額哲等		各以金印、玉帶、諸色數珠、蟒緞、金銀器皿、駝、馬等進獻	二 25： 322
9	天聰九年九月丁巳	太宗以第二公主許妻林丹汗子額哲，額哲行聘禮設盛筵進獻		蟒緞、黃金、金器、各色數珠、貂褂衣服、甲冑、雕鞍、駝、馬	二 25： 323
10	天聰十年（1636）正月丙辰	察哈爾汗子額哲以尚第二公主，行納吉禮具盛筵進獻		雕鞍、馬、駝、琥珀數珠、緞衣、蟒緞、文綺等物	二 27： 345
11	天聰十年二月丙子		以阿祿喀爾喀部落初遣使來朝	賜碩雷琥珀數珠、雕鞍、甲冑、撒袋、刀、韉帶、虎豹海獺等皮，並金銀器皿、蟒緞等物，甚厚	二 27： 349
12	天聰十年三月丁卯	外藩蒙古十六部落四十九貝勒以請太宗稱尊號來朝進獻		駝、馬、蟒緞、貂皮、琥珀數珠、貂裘等物，酌納之	二 28： 358
13	崇德元年（1636）七月庚午		賜貝勒伊爾都齊及其妻	鞍馬、甲冑、各色衣服、帽、韉、珊瑚數珠、銀器、綵緞、文綺等物	二 30： 386
14	崇德元年十一月甲辰	察哈爾公主具盛筵進獻		金茶桶、金盆、金壺、玉數珠、珍珠衫、蟒緞、緞、翠緞、倭緞、衣服、嵌松子石青金石鞦韆等物	二 32： 400
15	崇德元年十一月甲子		賜馬哈撒嘛諦汗及眾台吉大臣等	雕鞍、韉帶、佩刀、撒袋、弓、金銀器皿、珊瑚數珠、貂鑲朝衣、蟒緞、白金、布疋等物有差	二 32： 406
16	崇德二年（1637）閏四月辛未		太宗等至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率臣朝見，……辛未大妃辭歸設大宴送之	賜鞍、馬、衣服、靴、襪、綵緞、珊瑚數珠、珠玉項圈、銀器等物	二 35： 451

17	崇德三年 (1638)六月丁未	鄂爾多斯部落額林臣濟農等六十四人，土默特部落古祿格章京，陶虎章京等九十六人來		朝貢馬、駝、數珠、綵緞等物	二 42 : 449
18	崇德三年十二月乙卯	駐扎歸化城古祿格、毛圖俄博尼、杭古特濟、伊蘇德爾多爾濟等		馬匹並珊瑚數珠、綵緞等物	二 44 : 588
19	崇德四年 (1639)六月丁亥		賜起品公塔瞻、固山額真拜尹圖、阿山、葉臣、圖爾格、譚泰、杜雷、承政英俄爾岱、薩穆什喀、伊孫、索海等	珊瑚數珠各一	二 47 : 622
20	崇德五年 (1640)正月癸丑	外藩科爾沁國、郭爾羅斯部落、杜爾伯特部落等十三旗，歸化城土默特部落古祿格章京一旗、杭高章京一旗獻		珍珠數珠、黃金、綵緞、馬匹等物	二 50 : 659
21	崇德五年閏正月己亥	太宗僖皇后諸妃及和碩親王等幸固倫公主固倫額附額哲第，公主額駙具盛筵		獻金佛、各色數珠、東珠項圈、黑狐裘、貂裘、貂鑲朝衣、帽、鞭、金鞵帶、雕鞍、馬、金銀器皿等物，酌納之	二 50 : 671
22	崇德五年六月丁酉	駐歸化城土默特部章京古祿格、鄂爾多斯濟農等來朝		貢琥珀數珠、綵緞、文綺、駝、馬	二 52 : 697
23	崇德六年 (1641)正月丁丑	歸化城章京古祿格來朝		貢駝、馬、珍珠數珠、綵緞、文綺等物	二 54 : 720
24	崇德六年三月甲辰	諾木齊塔布囊、吳巴什台吉等來見，賜宴		獻雕鞍、馬匹、琥珀念珠、金銀器皿、蟒衣等物，悉御之	二 55 : 740

25	崇德七年 (1642) 四月 癸酉	祖大壽、祖大樂、 祖大弼、夏承德、 祖澤遠、祖澤沛、 祖澤洪等		各獻珊瑚樹、琥珀珍珠等數珠、 珠籠、珠花、沈香、玉帶、赤 金首飾、玉壺、玉犀、玻璃瑪 瑙金銀等盃盤……貂猓狸獾狐 豹天馬皮等裘，……緞、雕鞍 馬……，酌納一二	二 60： 824
26	崇德七年八 月丙午	鄂爾多斯部落布 達代楚虎爾善達 台吉、古魯台吉、 綽爾扎爾台吉率 三十三人來朝		貢秋季馬、駝、數珠、倭緞等 物	二 62： 849
27	崇德七年八 月乙丑	以和碩鄭親王濟 爾哈朗女配阿祿 部落穆章，是日 行婚禮		獻甲冑、馬、駝、貂裘、珊瑚 數珠等物，酌納之	二 62： 851
28	崇德七年十 月己亥	西藏圖白忒部落 達賴喇嘛遣伊拉 古克三胡土克圖 等喇嘛同至盛 京，太宗設大宴		各獻駝、馬、番菩提數珠、黑 狐皮、絨單、絨褐、花毯、茶 葉、狐腋裘、狼皮等物，酌納 之	二 63： 859
29	崇德八年 (1643) 二 月丁丑	土默特部落古祿 格章京等來朝		貢駝、馬、蟒緞、琥珀珊瑚數 珠等物	二 64： 882
30	崇德八年七 月戊戌	駐歸化城土默特 部落眾頭目來朝		貢黃金、珊瑚數珠、各色綵緞、 馬匹	二 65： 898
31	順治元年 (1644) 十一月癸巳		賜科爾沁國土 謝圖親王下顧 習車臣綽爾濟 鄂爾多斯部落 濟農台吉古祿、 吳爾哲、吳弩 渾、沙克查等	銀壺、珊瑚數珠、紬、緞、雕 鞍、繡衣、白金等物	三 11： 106
32	順治二年 (1645) 正 月甲午		賜宜爾登巴圖 魯	珊瑚數珠、蟒緞、玉杯等物	三 13： 120
33	順治二年六 月甲午		命翁牛特部落 故郡王孫杜梭 之孫波托和襲 爵	賜角弓、數珠各一	三 18： 160

表三 表二第 19、32 條受賞賜數珠者之身分表

序號	人名	職位	身分	出處
1	塔瞻	超品公	滿洲正黃旗	《八旗通志》 ⁷⁷ 卷 150，頁 1
2	拜尹圖	固山額真	滿洲鑲黃旗	《八旗通志》卷 77，頁 29
3	阿山	都統	滿洲鑲白旗	《八旗通譜》 ⁷⁸ 卷 61，頁 1
4	葉臣	都統	滿洲鑲紅旗	《八旗通譜》卷 28，頁 1-2
5	圖爾格	都統	滿洲鑲白旗	《八旗通譜》卷 5，頁 5
6	譚泰	都統、吏部尚書	滿洲正黃旗	《八旗通譜》卷 6，頁 5
7	杜雷	都統	不詳	《八旗通志》卷 210，頁 23
8	英俄爾岱	戶部承政	滿洲正白旗	《八旗通志》卷 156，頁 15-19
9	薩穆什喀	工部承政	滿洲正白旗	《八旗通譜》卷 19，頁 22-23
10	伊孫	兵部承政	滿洲鑲白旗	《八旗通志》卷 167，頁 13-15
11	索海	工部承政	滿洲鑲黃旗	《八旗通志》卷 136，頁 16-18
12	宜爾登	議政大臣	滿洲鑲黃旗	《八旗通譜》卷 5，頁 5

77 (清)高宗，《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671。

78 (清)高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5-456。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唐)歐陽詹,《歐陽行周文集》,收入王雲五主編,《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冊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平湖葛氏藏明正德本影印。
- (唐)釋皎然,《杼山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影印,1992,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刊《唐三高僧詩》微捲影印。
- (明)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收入《清史資料(第三輯)》,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9。
- (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明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冊5,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
- (清)允祿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4-41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55-4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55-4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32-63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國朝宮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5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文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冊1305,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四十九年文津閣本影印。
- (清)高宗,《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6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1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20-6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高宗,《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傅恒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23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滿洲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四年穿戴檔》,收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32-32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廿一年穿戴檔》,收入《圓明園》,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827-911。
- 今西春秋譯,《滿和蒙和对訳滿洲實録》,東京:刀水書房,1992。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23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縣:國史館,1986-1992。

近代論著

- 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張海斌主編,《美岱召壁畫與彩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 甘懷真,《儀禮·君權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
- 任萬平主編、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1·太祖太宗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 何傳馨主編，《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 李芝安，〈清代朝珠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19期，2013年6月，頁102-110。
- 李鵬年，《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
- 祁美琴，〈從清代「內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傾向〉，《清史研究》，2016年2期，頁1-25。
- 邱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柯嘉豪，趙悠等譯，《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上海：中西書局，2015。
- 唐均，〈從母語文字記載看女真人的多元宗教生活〉，《青海民族研究》，23卷1期，2012年1月，頁53-60。
- 馬仁杰、黃偉，〈清代檔案管理機構及其人員考略〉，《檔案學通訊》，2014年1期，頁97-101。
- 張淑芝，〈清宮朝珠與滿族東珠〉，《滿族研究》，1995年2期，頁39-42。
- 張德澤，《清朝國家機關考略》，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 莊吉發，〈服制鼎成——以東珠為飾看清代冠服制度的特點〉，《故宮文物月刊》，98期，1991年5月，頁4-23。
- 莊吉發，《文獻足徵：以「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本為中心的比較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8。
- 郭美蘭，〈五世達賴喇嘛入覲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2期，頁33-41。
- 陳夏生，〈再談清代服飾的朝珠與手串〉，《故宮文物月刊》，274期，2006年1月，頁88-96。
- 陳楠，〈明代法王釋迦也失在北京活動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卷4期，2004年4月，頁91-97。
- 陳楠，〈釋迦也失在南京、五台山及其與明成祖關係史實考述〉，《西藏研究》，2004年3月，頁99-106。
- 陳慧霞，《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
- 嵇若昕，〈朝珠與帽頂〉，《故宮文物月刊》，22期，1985年1期，頁92-97。
- 景聞，〈數珠、念珠與朝珠的定名演變〉，《藝術設計研究》，2016年1期，頁32-38。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梁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 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 馮智，〈五世達賴喇嘛入覲——兼論清順治至乾隆朝冊封達賴喇嘛的問題〉，《普門學報》，22期，2004年7月，頁1-22。
- 楊劍宇，《中國秘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葉高樹，〈滿族貴族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3期，2010年6月，頁173-230
- 達力扎布，〈清太宗邀請五世達賴喇嘛史實考略〉，《中國藏學》，83期，2008年3月，頁72-81。
- 趙毅、劉慶宇，〈清建國前女真人之佛教信仰〉，《史學月刊》，2008年9期，頁29-35。
- 樸文英，〈清代的朝珠與數珠〉，《滿族研究》，2001年1期，頁59-60。
- 賴依縵，〈晚清西藏入貢僧俗考——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半寶石數珠進貢者為例〉，《漢學研究》，37卷1期，2019年3月，頁151-194。
- 謝繼勝、賈維維，〈元明清北京藏傳佛教藝術的形成與發展〉，《中國藏學》，31卷4期，2011年1月，頁149-161。
- 嚴勇主編、故宮博物院編，《清史圖典·2·順治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 樂曄，〈試論沈陽故宮博物院院藏朝珠〉，《滿族研究》，2009年2期，頁118-121。

圖版出處

- 圖 1-1 清，〈太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5。
- 圖 1-2 清，〈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7。
- 圖 1-3 清，〈世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00010083。圖版取自李芝安，〈清代朝珠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19 期，2013 年 6 月，頁 105，圖四。
- 圖 1-4 清，〈聖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9。
- 圖 1-5 清，〈世宗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8。
- 圖 2 清，〈草珠念珠〉，世宗憲皇帝供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93。
- 圖 3 清，〈木子數珠〉，乾隆四十一年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7751。
- 圖 4 〈王格張格來貢〉，《滿洲實錄》。圖版取自任萬平主編，《清史圖典·1·太祖太宗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51。
- 圖 5 清，十七世紀，〈太宗朝服畫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任萬平主編，《清史圖典·1·太祖太宗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229。
- 圖 6 清，十七世紀，〈孝惠章皇后朝服畫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任萬平主編，《清史圖典·2·順治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 171。
- 圖 7 清，十七世紀，〈美岱召壁畫·三娘子畫像〉。圖版取自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張海斌主編，《美岱召壁畫與彩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00。
- 圖 8 清，十七世紀，〈美岱召壁畫·第三代順義王扯力克畫像〉。圖版取自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張海斌主編，《美岱召壁畫與彩繪》，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 101。
- 圖 9 明，〈水晶數珠〉，湖北梁莊王墓出土，圖版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梁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一九六。
- 圖 10 清，〈鳳眼菩提數珠〉，乾隆元年收章嘉胡圖克圖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7724。
- 圖 11 清，〈嘎布拉念珠〉，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呢恭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938。
- 圖 12 清，〈珊瑚數珠〉，嘉慶十一年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5139。
- 圖 13 清，〈孝莊皇太后便服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39。
- 圖 14 清，〈聖祖茶晶念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009。
- 圖 15-1 清，〈太祖御用東珠朝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5。
- 圖 15-2 清，〈太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
- 圖 15-3 清，〈太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 圖 16-1 清，〈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7。
- 圖 16-2 清，〈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
- 圖 16-3 清，〈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背面。
- 圖 16-4 清，〈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 圖 17-1 清，〈世祖御用東珠朝珠〉，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000100083。圖版取自李芝安，〈清代朝珠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19 期，2013 年 6 月，頁 105，圖三。
- 圖 17-2 清，〈世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digicol.dpm.org.cn>，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
- 圖 17-3 清，〈世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佛頭珠。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digicol.dpm.org.cn>，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6 日。
- 圖 18-1 清，〈聖祖御用東珠朝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9。
- 圖 18-2 清，〈聖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
- 圖 18-3 清，〈聖祖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 圖 19-1 清，〈世宗御用東珠朝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8。
- 圖 19-2 清，〈世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
- 圖 19-3 清，〈世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 圖 20-1 清，〈仁宗御用東珠朝珠〉，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1746。
- 圖 20-2 清，〈仁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背雲。
- 圖 20-3 清，〈仁宗御用東珠朝珠〉，局部，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 圖 21-1 清，〈伽楠香小朝珠〉，乾隆四十八年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3262。
- 圖 21-2 清，〈伽楠香小朝珠〉，局部，背雲。
- 圖 22-1 清，〈金珀小朝珠〉，乾隆十一年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雜 007679。
- 圖 22-2 清，〈金珀小朝珠〉，局部，背雲。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Qing Dynasty Court Beads

Chen, Hui-hsia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use of court beads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a special place within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apparel and accessories at the imperial court. The present study builds upon the research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by reassess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ourt archives and then compares them to the style and form of court beads that survive toda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ree facets emerge that are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First, the actual name of court beads shows that they consistently encompassed two functions, one religious and the other political in nature. Secon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ibetan Buddhist beliefs of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with Mongolia and Tibet, the study explores how court beads incorporated religious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stylistic formation and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political symbol. Third, changes among the groups who used court beads offer a glimpse into how the political elite with interpretive authority played a role in developing court beads as a part of court apparel.

Court beads all along had both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Early forms were influenced by Mongolian bead strings and not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prayer beads of a religious nature. After the Manchus took control of China under the Shunzhi emperor, the peoples under their rul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to include many Han Chinese with a background in Confucian culture. While retaining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bead strings, such ornaments as the “back cloud” string were thus included to create a standardized form giving bead strings political meaning as well. Then, under the Yongzheng emperor, the name for these beads went from “court stately bead strings” to just “court beads,” further testifying to the political status that they reached at this time.

As for the changes among the groups who used court beads, in the early days they were restric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Manchu nobility. At the court of the Kangxi emperor, the group was expanded to include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of middle and high rank, thereby restricting court beads to important officials in the country.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Yongzheng reign, however, lower level officials in the Forbidden City and as part of the emperor’s retinue or staff were included. Starting from the early Qianlong reign, and with the concurrent and attendant status of courtiers, court beads also became a

required accessory among high officials accompanying the emperor. Gradually, the groups approved to use court beads exceeded the rank limitation prescribed in official regulations to become symbolic of trusted aides to the emperor. Furtherm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from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Directorate of Ceremonies meant that they, too, had to wear a formal set of court beads. Such wa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earer of court beads and imperial authority, the emperor himself, and the state, thereby delineating a political realm of high rank for court beads symbolizing the emperor at its center.

Keywords: Court beads, Qing dynasty dress system, prayer beads, bead string, imperial authority, Tibetan Buddhism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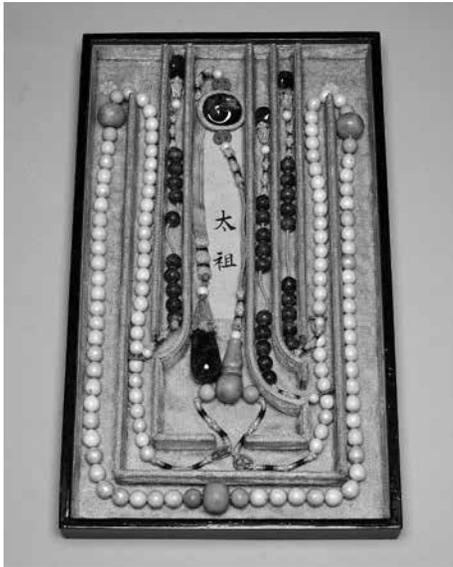


圖 1-1 清 太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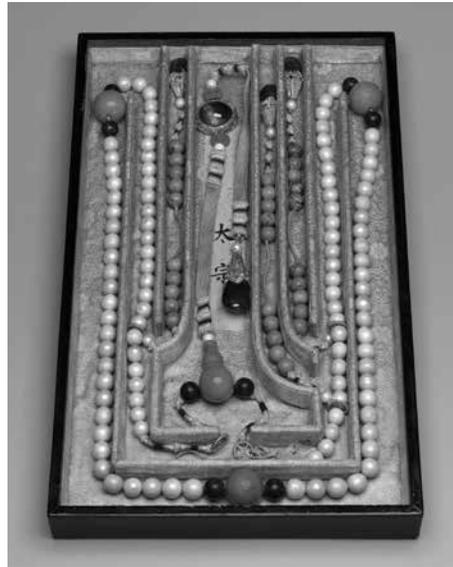


圖 1-2 清 太宗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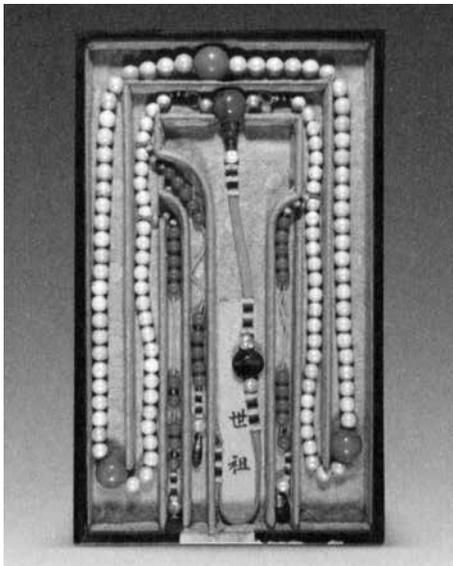


圖 1-3 清 世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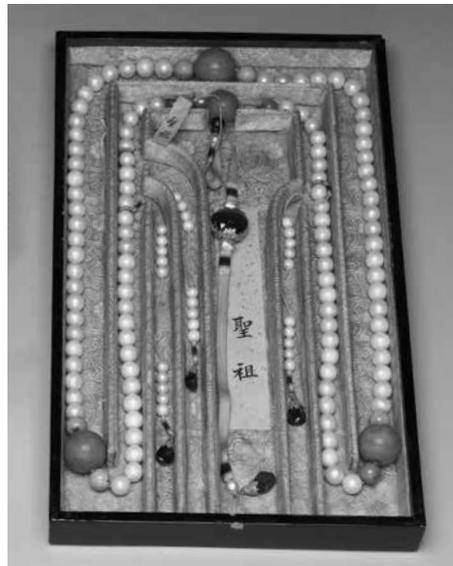


圖 1-4 清 聖祖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 世宗御用東珠朝珠及單蓋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清 草珠念珠 世宗憲皇帝供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 清 木子數珠 乾隆四十一年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1 王格張格來貢 《滿洲實錄》
頁 107



圖 4-2 王格張格來貢 局部



圖 5 清 十七世紀 太宗朝服畫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6 清 十七世紀 孝惠章皇后朝服畫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清 十七世紀 三娘子畫像 美岱召壁畫



圖 8-1 清 十七世紀 第三代順義王扯力克畫像 美岱召壁畫



圖 8-2 清 十七世紀 第三代順義王扯力克畫像 美岱召壁畫 局部



圖 9 明 水晶數珠 湖北梁莊王墓出土



圖 10 清 鳳眼菩提數珠 乾隆元年收章嘉胡圖克圖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清 嘎布拉念珠 乾隆四十五年 班禪額爾德呢恭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2 清 珊瑚數珠 嘉慶十一年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1 清 孝莊皇太后便服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4 清 聖祖茶晶念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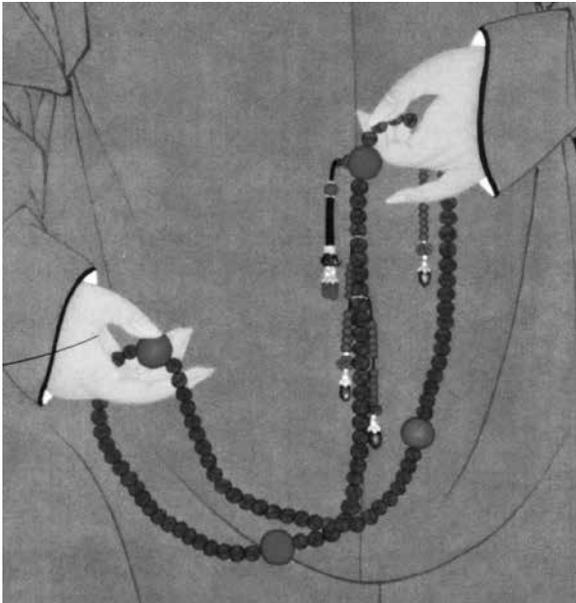


圖 13-2 清 孝莊皇太后便服像 局部

I 式：



圖 15-1 清 太祖御用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1 清 太宗御用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I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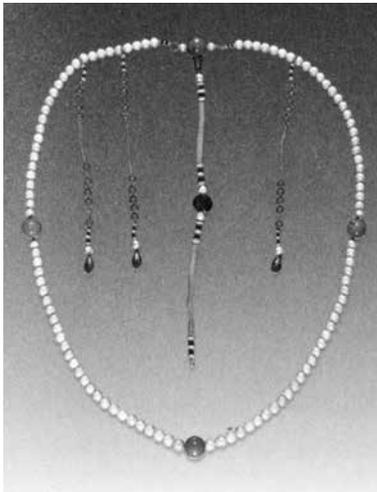


圖 17-1 清 世祖御用東珠朝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1 清 聖祖御用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1 清 世宗御用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I 式：



圖 15-2 清 太祖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圖 16-2 清 太宗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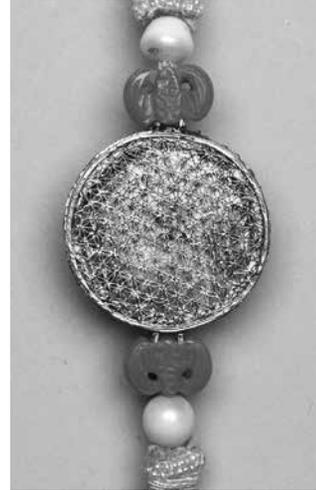


圖 16-3 清 太宗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背面

I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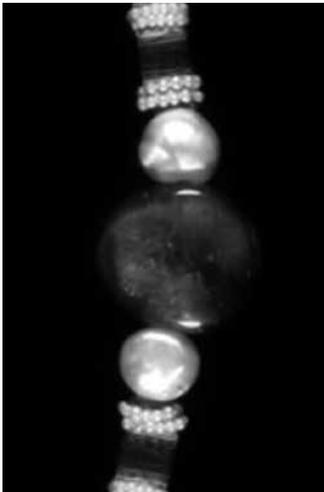


圖 17-2 清 世祖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圖 18-2 清 聖祖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圖 19-2 清 世宗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圖 20-1 清 仁宗御用東珠朝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2 清 仁宗御用東珠朝珠 背雲

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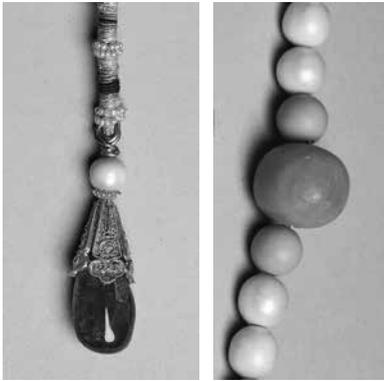


圖 15-3 清 太祖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I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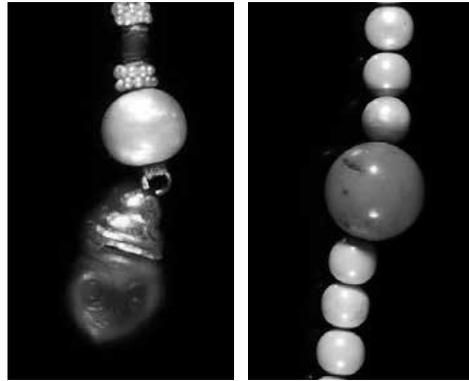


圖 17-3 清 世祖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佛頭珠



圖 16-3 清 太宗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圖 18-3 清 聖祖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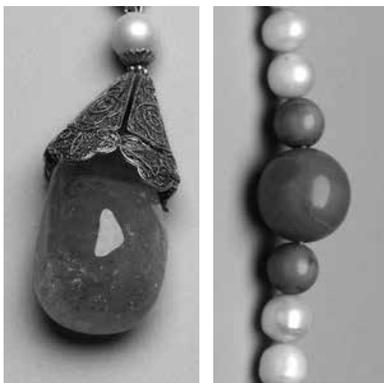


圖 20-3 清 仁宗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圖 19-3 清 世宗御用東珠朝珠 墜角金寶蓋、夾間珠



圖 21-1 清 加楠香小朝珠 乾隆四十八年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2 清 加楠香小朝珠 局部



圖 22-1 清 金珀小朝珠 乾隆十一年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2 清 金珀小朝珠 局部